



杨天石评说近代史



晚清风云



中国发展出版社
CHINA DEVELOPMENT PRESS



杨天石评说近代史

晚清风云



中国发展出版社
CHINA DEVELOPMEN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晚清风云 / 杨天石著. —北京: 中国发展出版社, 2015. 9

(杨天石评说近代史)

ISBN 978-7-5177-0304-4

I. ①晚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中国历史 - 近代史 - 研究 IV. ①K25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70601 号

书 名: 晚清风云

著作责任者: 杨天石

出版发行: 中国发展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)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77-0304-4

经 销 者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23

字 数: 330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 元

联系电话: (010) 88919581 68990692

购书热线: (010) 68990682 68990686

网络订购: <http://zgfcbs.tmall.com/>

网购电话: (010) 88333349 68990639

本社网址: <http://www.developress.com.cn>

电子邮件: 370118561@qq.com

版权所有 · 翻印必究

本社图书若有缺页、倒页, 请向发行部调换

新 序

毛泽东 1935 年 10 月所作《念奴娇》词云：

横空出世，莽昆仑，阅尽人间春色。飞起玉龙三百万，搅得周天寒彻。夏日消溶，江河横溢，人或为鱼鳖。千秋功罪，谁人曾与评说？

毛泽东此词写的是亚洲中部的大山系，也是中国西部山系的主干昆仑山。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，横贯新疆、西藏之间，蜿蜒伸展至青海境内，全长 2500 公里，平均海拔 5500 ~ 6000 米，宽 130 ~ 200 公里，总面积达 50 多万平方公里。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，它被称为“万山之祖”，又被视为中华“龙祖之脉”。毛泽东在词中描写了它的雄伟阔大的气势和悠远绵长的历史，叙述了它对中华大地、中华民族的“功罪”，慨叹于“谁人曾与评说”。

昆仑山可以“评说”，历史、中国历史、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何尝不可以“评说”？

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的老祖宗一样重视历史。历史被认为是正衣冠、知美丑的镜子，是辨善恶、考得失、增经验、长智慧的教科书，因此，它应该被人“评说”，任人“评说”，特别是自由“评说”。

首先是“说”。历史已逝，看不见，摸不着，只有靠历史学家“说”，用嘴、用文字或用图像，它才能广为人知，传之久远。历史学家要充分掌握资料，精细考辨，力争说得真实、准确、全面，尽最大可能符合历史本来面目，不能“胡说”。“胡说”的结果必然谬种流传，贻误读者。其次是

“评”。“评”能表现历史学家的理解、议论和价值判断。在“说”与“评”之间，“说”最重要。“说”是基础，只要“说”得真实、准确，广大读者都可以根据你所“说”的史实，做出自己的判断和评论。这一方面，我们要高度相信读者。多年来，我是主张先“说”后“评”、多“说”少“评”，甚至可以只“说”不“评”的。最不应该的是，不把史实说清楚、道明白，就急于将自己的评论强塞给读者。至于为了某种功利的需要或某种目的，有意掩盖、“虚无”、扭曲、夸大部分史实，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“史实”，那就更等而下之，应该坚决反对了。

世无超人，现实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和不足。任何人都不可能一次就认识全部真理，同样，历史学家也不可能一次就认识全部历史真相。历史学家所“说”、所“评”，都可能不当、不妥、不全，甚至大谬不然。怎么办？百家争鸣呗！毛泽东所提倡的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是繁荣艺术和学术的唯一办法，是清除谬误、探索真理的正确途径。利用行政权力，强制推行一花、一派、一种观点的做法是错误的、有害的。

如果从1958年选注《近代诗选》开始计算，笔者从事近代史研究已经57年。如果从弃文从史，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起计算，也已经37年。笔者所写论文、札记曾选编为“杨天石近代史文存”五卷本出版。出版后此套书一再加印，甚至被盗版。由于这套书部头大，读者捧起书像捧起一块大砖头，颇多不便，因此，台湾地区风云时代出版公司曾以“揭开民国史真相”为总题，改出七卷本。现在中国发展出版社以“风云版”所分为据，稍作调整，仍为七卷。应该说明的是，笔者2009年以后所作，因另有《找寻真实的蒋介石》第二辑、第三辑等专书，本套书暂未收入。

书中“评说”难免谬误或不当之处，欢迎批评指教。

杨天石

2015年8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

原序

人们生活在今天，规划并创造明天，自然希望了解昨天。昨天就是历史，一切过去了的都是历史。

了解历史的最重要的办法是阅读历史著作。自然，这样的历史著作必须是真实的、客观的、公正的。假的或掺了假的历史著作，人们不会愿意看；讳饰或有所讳饰的历史著作，人们也不会乐意看。但是，历史著作要达到真实、客观、公正，并不容易。这是由于：其一，历史创造者的活动常常具有诡秘性，许多事件，策划于密室，进行于幕后，公开者、示人者往往一鳞半爪，半真半假，甚至全假。其二，历史本质的显露需要一段过程，在这一过程尚未终结之前，人们一时还难以全面认识其本质。其三，历史创造者分为不同的派别，各有不同的立场、观点，即使对同一事件，也常常会有不同的陈述和评价。其四，历史的记录者大都有自己的倾向、爱憎，其记录自然也难免反映这种倾向和爱憎，有某种偏见、局限、谬误、片面性在所难免。其五，许多事件没有记载，或挂一漏万，或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所以，研究历史难，写出真实的、客观的、公正的历史更难。历史学家的可贵就在于能克服上述种种困难，尽最大可能为世人记录、再现、还原真实的历史本相。达到了这一境界，就达到了历史科学的基本要求。

然而，在现实中，人们常常并不将历史学看作科学，而是将之视为工具——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，或者是一种宣传工具。例如政治家常常从自己的需要出发，利用历史来宣扬本派主张的正确，批评对立派别的谬误，或者

2 杨天石评说近代史

用来宣扬某种于己有利的观点，以期影响社会，塑造舆情，争取群众，为己服务。权力机构会为史家规定这样、那样的禁律：什么可以写，什么不可写；必须如何写，不能如何写之类。其结果是：有利于某派或某种需要者，张扬之，放大之，变造之，奖掖之；不利于某派或某种需要者，隐匿之，缩小之，扭曲之，禁绝之。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历史，往往妍媸随意，美丑随时，真正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。哪里有真实可言，哪里有科学可言！

当然，历史学必须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服务。中国古代讲究经世致用，于史学，则特别强调其“资治”功能，这都是不错的。历史学如果不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，要它何用！因此，本书著者赞成史家关注现实，“经世”“资治”，从这个意义上，著者肯定“工具”说的合理内涵，但是千万要注意，史学的这种功能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，符合历史的真实和本质，无论如何不能也不应该违背历史，不能故意扭曲、剪裁历史以为己用。有些人常常不懂得，人们可以被蒙蔽于一时，但却不会被蒙蔽于永远。扭曲者有时会取得某种效果，但有时则反，其效果等于零，甚至是负数。林则徐有诗云：“青史凭谁定是非？”从人类发展的长河来看，历史的真相会大白，是非也会有公论。

本书著者年轻时志在文学，但造化弄人，最终走上了研究历史的道路。一转眼已经三十余年。面对历史学的汪洋大海，常生“去日苦多，所成无几”之叹。不过，有一点可以告慰读者的是，本书著者一贯以揭示历史奥秘、追求历史真实为鹄的，决不做讳饰历史、扭曲历史的勾当。当然，由于本书著者的局限，书中各文又成于多年中，自然也难免存在这样、那样的缺点、问题甚至谬误，诚恳地希望专家、读者指正。民国史充满着政治斗争，治民国史有其特殊的困难。在这个领域内，政治的干扰和影响最多，未经厘清的史实最多，观点的对立和分歧也最多，本书著者的希望是：在宽松、自由的学术环境下，海内外学界切磋讨论，问难攻防，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，使民国史著作的科学水平日渐提高，逐渐臻于真实、客观、公正。

著者

2009年8月3日于北京九华山庄

目 录

马桶阵、面具兵与“五虎”制敌 1

龚自珍曾经慨叹，当时不仅没有才相、才史、才将、才士、才工、才商，甚至连才偷、才盗也没有。大摆马桶阵的杨芳、驱遣面具兵的宋国经、根据签语安排作战的奕经，在愚昧这一点上与相信灵符下肚，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并没有多大区别。

《天朝田亩制度》与“割尾巴” 3

“处处平均”从来都只是一种幻想，凡是平均主义盛行的地方，总是伴生着森严的等级制度，同时也伴生着普遍的贫穷和匮乏。

太平天国的“太阳” 5

在我国，太阳从来是和“王者”“君”一类人联系在一起的。作为小生产者的代表，洪秀全虽是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，也是皇权主义者，他自称“太阳”不足为怪。

黄遵宪的《朝鲜策略》及其风波 8

黄遵宪不了解，有些人可以转变，有些人是固守旧章，宁死不肯改弦易辙的。正如黄遵宪所说，“函关难闭一丸泥”，历史已经进入世界各国广泛交往的年代，闭关自守再也不可能了。

黄遵宪与苏州开埠交涉 24

《马关条约》签字后，十分沉痛、郁闷的黄遵宪曾向张之洞提出十条补救意见，在主持苏州开埠谈判时也完全没有媚外惧外气息，尽心尽智，力谋为国家效力，但湖广总督张之洞却对谈判结果很不满意。

慈禧太后其人

——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演讲 40

善于抓权、夺权、集权，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，镇压戊戌变法，签订《马关条约》《辛丑条约》等丧权辱国条约是慈禧太后的三大罪过；而她支持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洋务运动，实行具有资本主义改革性质的“新政”，是否可以适当肯定呢？

光绪皇帝的新闻思想 55

正确的决策源于对情况的正确、全面的掌握。一百多年前，光绪皇帝为了使朝廷“明目达聪”，找到治理国家的正确方法，就持有宣扬国是、胪陈利弊、开拓见闻、据实畅言的新闻思想。

翁同龢罢官问题考察 59

罢免翁同龢的，是后来抓捕康梁等人的慈禧太后，还是和翁同龢有着多年师徒之谊、情同父子的光绪皇帝？揆诸史实，恐怕还是光绪皇帝的原因多。

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 76

为了维护封建伦理，康有为矢口否认有过“谋围颐和园，劫制皇太后”一事，直斥为袁世凯离间。然而他想不到，这一“疑案”最终大白。历史是糊弄不得的。

康有为“戊戌密谋”补证 83

毕永年留下的日记，梁启超订立攻守同盟的密札都证明，当年，康有为等确有“密谋”。古语云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信然。

天津“废弑密谋”是维新派的虚构 87

一切假话、假史都应该揭露。与其说“天津废弑密谋”是康有为等人的猜测或忧虑，不如说是他们的虚构。

袁世凯《戊戌纪略》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 93

历史是极为复杂的，进步人物可能说假话，反面人物也可能说真话。一切史料都必须经过考证和检验，否则我们就可能被虚假的东西牵着走，陷入迷宫而不能自拔。

没有不可变的“祖宗之法”

——戊戌维新运动一百周年感言 108

再好的法，在岁月的迁移中也会或衰败，或过时，不能再用。一个伟大的政治家，一个英明的政治集团，必须根据发展变化了的情况，决定自己的政策，选择适宜于当时当地的制度。

唐才常佚札与维新党人的湖南起义计划 111

距慈禧太后重新训政不久，康有为、唐才常就决心以武力为维新事业开辟通路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跃进。可惜。

须磨村密札与改良派请杀袁世凯的谋划 115

尽管康有为以康熙擒鳌拜等事为例，要求载沣杀袁世凯，但在武昌起义的疾风暴雨中，载沣不得不启用袁世凯。杀袁世凯，载沣非不欲也，实不能也。

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 125

从戊戌维新到兴中会惠州起义，毕永年都是个重要人物。在为数不多却有谬误的相关记载中，毕永年“不知所终”，然而事实是，惠州起义失败后，毕永年卖掉西服，换上僧袍，逝世于惠州罗浮山寺，年仅三十二岁。

孙中山在 1900 年

——读日本外务省档案札记 137

1900 年是中华民族的多事之秋。义和团运动，八国联军侵华。孙中山四处奔走，千方百计利用时机，试图拯救危难中的祖国。

1901 年至 1905 年的拒俄运动 145

为了反对沙皇俄国侵略我国东北，蔡元培、马君武、鲁迅、廖仲恺、陈天华等仁人志士和广大群众掀起拒俄运动，成为戊戌维新以来第一次具有相当规模和声势的群众性爱国斗争。

陈天华的《要求救亡意见书》及其被否定经过 169

为了救亡，陈天华一度主张到北京向清朝政府“伏阙上书”，受到湖南留学生的强烈反对。在黄兴、宋教仁帮助下，陈天华纠正错误，主张革命，写下《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》等名篇。

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 174

思想观点和斗争策略方面的分歧，是导致同盟会分裂、两次发生“倒孙”风潮的真正原因。革命需要团结，敌人的辱骂、镇压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同营垒人员的涣散和离心。

《龙华会章程》主属考 208

误植的会名和倒填的时间，不经考察，被轻易地联系在一起，便酿成一件疑案。每一种历史文件都必然留有它产生的那个时间的痕迹，《龙华会章程》也不例外。

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 216

在考察历史公案时，对于双方过头的话，都应该根据可靠史实予以订正。章太炎与清朝大官僚端方的关系到底怎样，考察清楚了，对于研究章太炎、同盟会的内部矛盾以至于辛亥革命史都有一定意义。

何震揭发章太炎

——北美访报之一 230

何震企图搞臭章太炎，一时间人妖颠倒，黑白难明，章太炎被说成“背叛革命”，充当“满洲鹰犬”，但是，何震很快就暴露了自己是叛徒的真面目。

《民报》的续刊及其争论 235

透过凹凸镜看世界，一切都改变了样子。在《民报》续刊的争论中可以看出，孙中山和章太炎，彼此都将对方的形象大大地扭曲了。

1911年的拒英、拒法、拒俄运动 254

为了挽救中国的边疆危机，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分头发动，掀起了一场以拒英、拒法、拒俄为主要内容的反帝爱国运动。它是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的前奏，在舆论、组织、武装等方面为辛亥革命作了准备。

从“排满革命”到“联满革命”

——读刘揆一《提倡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民党会意见书》 274

革命党人原来主张“排满革命”，同盟会后期领导人刘揆一主张“联汉”“联满”“联蒙”“联回”“联藏”，团结各族人民，推翻清朝政府，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进步。

何天炯谈“三二九”起义

——读官崎滔天家藏书札 277

“三二九”起义得到海外华侨的支持，先后从南洋、美洲等地募得经费十余万元，黄兴之所以明知条件不利而坚持起义，其原因就在于不愿失信于慷慨捐输的爱国侨胞。

戊戌维新以来的“国民国家”思想 280

民主是一个旧课题，又是一个新课题；既是某一个国家的课题，又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课题。围绕着怎样建设一个民主国家，戊戌维新以来的不同派别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提出了众多的方案。

苏、陈译本《惨世界》与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潮 299

苏曼殊、陈独秀翻译的《惨世界》，既是译作，也是革命宣传品。从改造社会、改变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出发提出革命主题，总会或直接或间接地走向或走近社会主义。

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 312

国粹主义思潮是一种复古思潮，也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潮。它具有继承、发扬民族文化的爱国主义一面，也有拒绝变革、排斥外来进步文化的狭隘一面。

论《天义报》刘师培等人的无政府主义 330

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有着明显的矛盾，要使他的乌托邦化为现实，就必须建立政府，而且必须是一个高度专制的政府。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主义有时是对立面，有时则是如影随形的孪生兄弟。

马桶阵、面具兵与“五虎”制敌

鸦片战争时期有几则故事，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谈。

其一为杨芳大摆马桶阵。那是1841年春，道光皇帝派杨芳为参赞大臣，随靖逆将军奕山赴广州，防剿英国侵略军。说起这位杨芳，他原是清朝嘉庆、道光年间的一位名将，在镇压荆、楚白莲教及河南天理教起义中，屡立战功，官也从把总一直升到提督，成为省一级的高级将领。当他初到广东之际，人们耳闻他过去的事迹，“所到欢呼不绝，官亦群倚长城”。不想他进入广州之后，却突发奇论，说是：我在实地，夷在海上，风波摇荡，然而夷炮却能经常打中我，我炮却不能打中夷，肯定夷人有邪术。于是传令保甲大量收集妇女使用的马桶，载在木筏上，派一将率领，自己带兵埋伏在岸上。约定当侵略军来犯时，一声炮响，所有木筏一字排开，马桶口一齐指向敌人，他自己则从旁抄出夹击。令下之后，保甲当然照办，副将也遵命布阵。其结果当然可想而知。

其二为宋国经驱遣面具兵出战。侵略军打到浙江了，杭、嘉、湖地区的行政长官、道台宋国经想以奇兵制胜。他想到了宋朝名将狄青披发、戴铜面具作战的前例，便派人在市场上购买纸糊面具数百个，招募342个乡勇，装成鬼怪，在衙门内昼夜演习。操练纯熟之后，再派都司、千总一人率领这支“特种部队”出战。那天是个大白天，三百四十多个乡勇，人人戴着假面具，“跳舞而前”。其结果，当然也可想而知。

其三为奕经据签语决定反攻时间。奕经是道光皇帝的侄子，位居吏部

尚书。1841年10月，道光皇帝任命他为扬威将军，带兵驰赴浙江，反攻英军。途经杭州时，他在关帝庙求得一签，签语中有“不遇虎头人一唤，全家谁保汝平安”之句。奕经大喜，决定以“虎”制敌。按旧时说法，寅属虎，于是奕经便选择壬寅年、壬寅月、戊寅日、甲寅时作为反攻之期。这样便把时间定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（1849年3月10日）夜四更，共四虎。为了增加一“虎”，奕经又特命生年属虎的安义总兵段永福统率西路兵马。根据这样的原则确定的反攻，其结果当然更可想而知。

上述三事，第一事见于梁廷柅的《夷氛闻记》与佚名的《夷匪犯境闻见录》，第二事、第三事见于贝青乔的《咄咄吟》，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事之作，所述自当可信。特别是《咄咄吟》，它的作者原是苏州的一介书生，激于爱国义愤自动投到奕经麾下，“始命入宁波城侦探夷情，继命监造火器，寻又带领乡勇派赴前敌，终命帮办文案”，“内外机密，十能言之七八”，因此，他的著述就更加可靠。

鸦片战争中，堂堂的“天朝上国”居然败在“蕞尔岛夷”的手下，人们读了这三段故事，也许可以恍然于其原因了。

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历来重道轻器，把人伦、义理看得高于一切，视科学为雕虫小技，再加上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，上上下下形成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昏庸和愚昧。龚自珍曾经慨叹，当时不仅没有才相、才史、才将、才士、才民、才工、才商，甚至连才偷、才盗也没有。杨芳、宋国经、奕经的事例虽是个别的，但又是具有代表性的。其他人的知识水平并不见得比他们高明多少。官僚如此，百姓们又何尝相反。以后来的义和团为例，相信一道灵符下肚便可以刀枪不入，其实和杨芳的马桶阵之类并无多大差距。

愚昧不能抗敌，自然也不能兴邦裕民。中国要奋飞，就必须于铲除旧制度根基的同时，铲除滋生于此一土壤上的形形色色的愚昧。五四时期的先驱者于呼喊民主之外，又呼喊科学；今之国家领导人既提倡决策的民主化，又提倡科学化，都实在是对症的良方。

《天朝田亩制度》与“割尾巴”

不知怎的，近来读《天朝田亩制度》，常常想起大办人民公社些年头的“割尾巴”。

《天朝田亩制度》规定：“凡天下田，丰荒相通，此处荒则移彼丰处，以赈此荒处，彼处荒则移此丰处，以赈彼荒处。务使天下共享天父皇上帝大福，有田同耕，有饭同食，有衣同穿，有钱同使，无处不均匀，无人不饱暖也。”这是我们的史学著作竞相引用的名言，一向被认为是农民革命的伟大理想。这诚然是不错的。对于缺少土地、啼饥号寒的广大被剥削、被压迫的农民来说，无疑是向他们展示了一个诱人的美丽的天堂，会激励他们去推翻现存的只给他们带来贫穷和痛苦的社会。但是，未来社会果真是那么诱人吗？《天朝田亩制度》接着写道：“凡天下，树墙下以桑。凡妇蚕绩缝衣裳。凡天下，每家五母鸡，二母彘，无失其时。”

这就是说，每家都束缚在土地上，除种地外，还要植桑、养蚕、缝衣，可以养五只母鸡，两头母猪。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问题：第一，家家只养母，不养公，如何交配、繁殖？不能交配、繁殖，如何能生生不已地养下去？第二，如果有一家想多养几只鸡、几头猪怎么办？对于第一个问题，《天朝田亩制度》没有回答，笔者无从揣想；那第二个问题倒是好解决的。《天朝田亩制度》接着说：“凡当收成时，两司马督伍长，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，余则归国库。凡麦、豆、苾麻、布帛、鸡、犬各物及银钱亦然。”这里说得很清楚，每家只能留足自己的使用部分，其超额部分，则

要无偿“平调”，“归国库”了。自然，你要是多养了一只鸡、一头猪，也是要“归国库”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会使笔者想起那些年头的“割尾巴”的原因。虽属比拟不伦，但总不是匪夷所思吧？

史书上说，太平天国统治地区，农民生产积极性很高，太平军所到之处，地主不是被杀，就是逃亡，无地、少地的农民也就有了土地，自然积极生产。然而史书上又说，《天朝田亩制度》似乎从未实行过，因为它根本行不通。先不论它那烦琐的平分土地的办法，即以规定每家“五母鸡，二母彘”而论，也不足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更不足以造成强大的社会生产力。动不动就“余则归国库”，谁还肯多干呢？

太平天国以“处处平匀”相标榜，它之所以规定“余则归国库”，看来也是为了保证“处处平匀”，不至于造成贫富分化的“不匀”现象。但是，“处处平匀”从来都只是一种幻想，即使在太平天国也没有严格实行过。就拿吃肉来说吧，太平天国规定：天王每日给肉十斤（天哪！我不知道洪秀全的肚子如何吃得下），依次递减，至总制（相当于知府），每日半斤，总制以下则不给肉。至于鱼，有材料说，只有诸王才可食用。所以，凡是平均主义盛行的地方，总是伴生着森严的等级制度，同时也伴生着普遍的贫穷和匮乏。